

董晓萍 著

穿越文化层

中华书局

董晓萍 著

穿越文化层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文化层/董晓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0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ISBN 978-7-101-12199-5

I.穿… II.董… III.民俗学-研究 IV.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1994号

-
- 书 名 穿越文化层
著 者 董晓萍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责任编辑 陈若一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¼ 插页6 字数195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199-5
定 价 40.00元
-

目 录

多师造化

知与识	3
知识复兴时期的三代人	4
有容乃大	7
纸媒时代的人刊亲情	19
编辑部的故事	25
传与承	29
钟敬文与中国民间文艺学	29
季羨林与钟敬文	61
钟敬文·游国恩·金开诚	74
聂石樵加入“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	84
大学者精神	93
教育诗	106
学术书信	121
启功与清宫文化	126
东与西	139
翻译与跨文化	
——中、德、美三种中国故事类型比较	139

外国文学教育与民间文学研究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民间文艺学比较	215
蝴蝶东西飞	263
邮件社会学	275
百科文为先	283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291

穿过分层

祖国的田野	313
从十年到十年	313
文献与田野	322
敞开社会的大门	328
异邦的田野	332
牛津的洋庙会	333
巴黎公社的红色记忆	340
巴尔扎克、雨果和齐达内	346
高速公路“一棵树”	362
学者的农舍	366
“三家村”	373
后 记	381

多师造化



知与识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趋于“短、平、快”，但在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古国不同，被数千年的“文化”炉火熬炼出来的“知识”，存于馆阁和民间，藏于纸墨深巷，反而历久弥香。当今世界无论怎样“化”来“化”去，都离不开这些“文化”和“知识”，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依靠的正是这份极其深厚的底蕴，它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维护特色、传承导向与未来面貌。《文史知识》正是传播这种“文化”和“知识”的杂志。

《文史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到来之初创办，三十余年来经历了“文化热”的全过程，也经受了其后到来的市场经济与文化较量的考验。它正确地阐释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体部分的历史文化知识，在现

代社会转型中恪守文化知识的价值和地位，在新时期涌现的难以胜计的杂志中一枝独秀。

好杂志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精神的晶体，也是一种物质的实体。虽然再好的杂志也会在社会追捧与公众吸引力褪去之间循环，在盛与衰之间往复，但《文史知识》的生命力却是稳固的。它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办刊者有成熟的文化自觉。如果再将《文史知识》的生命力与其物质条件相联系，这种意义也就更为明显。

知识复兴时期的三代人

《文史知识》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在于它重视在团队内部进行学术文化传承。它的第一代作者季羨林、张岱年、钟敬文和程千帆等先生，都是我国现代学术各领域的顶级宗师。在《文史知识》办刊的三十余年中，他们往来稿件达二十年以上，占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它的第二代作者，有汤一介、金开诚、吴小如、白化文、杨牧之、黄克、瞿林东、田居俭、徐公持和臧嵘等名家。接下来是第三代，他们是第一代学者的入室弟子，追随前辈锲而不舍。他们也是第二代人的学生，第二代人与

他们亦师亦友，而这些数据都是有文化意义的，它能证明《文史知识》的文化自觉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有长期的规划，正所谓办刊有“格”。

《文史知识》拥有国内第一流的作者团队，但从不以简单地坐拥名家了事。多年来，编辑部主动与名家合作，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化热点问题，双方共同敲定题目，再磨合成文。这是一种操守很高的编刊之“德”。它对读者是一种恩惠，对编辑部本身却是很强的“约束”。它要求编辑部必须具有文化创意，必须在严谨的学者和以自由形态存在的现代读者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凝聚各方之力，建设杂志的公共阅读新空间。可贵的是，《文史知识》做到了，并将其转化为几代人的实践。

现在的《文史知识》已成为收藏传统文科国宝华章的“博物馆”。它汇聚了一批我国学术文化大家在人生最后岁月的晚秋硕果，包括其文章和墨迹。它将他们长期比较中外多元文化和深刻思考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意见加以整理发表，构建了新时期文史文化阅读的系统，对当代国家的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在这批大师均已谢世，这批资料已成为中华书局的“镇局之宝”。在这方面，《文史知识》功不可没。而也正是在这些

工作中,《文史知识》的位置远远超出了其他普通杂志,表现了独具的学术资源、独特的预测水平和独到的前沿性。这种异乎寻常的创意选择,纵令时光倒流,其他杂志也未必都能做得到。

与政治、经济的功利性相比,文化自觉的特征是其非功利性。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历史和文化变得很容易被遗忘,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助长了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文化的超功利性及其支撑人文传统的本质意义显露出来。《文史知识》是没有功利色彩的,它从不盲目媚俗,不哗众取宠,不追逐时尚。它在一度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把文化放进荷塘月色,回归烂漫山野,生动而流畅地加以阐释,展示其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有用性,令行色匆匆的现代人对它不能不驻足和凝望。三十年的成就证明,文化理念和价值是不能兜售的,它需要依靠编辑部真正站在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上,用理想、信念和学识去捍卫它。《文史知识》正因为具有这份理念和价值观,才能做出优异的贡献。他们总是在说文化人的话,说读书人的话,说有观点和有体会的话,因此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对其长期追随而热情不衰。

文化自觉的标识是独具风格,《文史知识》是一份风

格卓越的杂志。它雍容、典雅、亲切、自信，它的风格是它的内涵的体现。跟它打交道，如同跟一位高尚而又随和的朋友谈话。它的各个专题栏目，如“文史百题”“诗文欣赏”“学林漫话”“民俗志”和“交流与比较”等，也皆有风格，能引领方向，提升影响因子。

有容乃大

《文史知识》推广“知识”的胸怀可用“有容乃大”来形容，此指兼容多元文化。它的稿件总体说侧重上层文化，但也关注中、下层文化，经常刊登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章，这使许多学科的学者都愿意接近它和认同它。

我是20世纪80年代考入钟敬文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生的后学。在这之前，我只是仰慕《文史知识》大手笔阵容的一个无名晚辈，是它的百万读者中的一分子。我们这批人，从城市来到乡下，又从乡下回到城市，亲眼看到了祖国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上下差别，心中有十万个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对这种种社会差别，寻书问学愿闻其详，于是《文史知识》就成了最适合我们“饿补”的一本杂志。它的文风亲切，堪可抚慰莘莘学子的心灵；

它的选题丰富，给复杂的人文现象以文化意义、历史传统和现实阐释；在民间舆论中，它的地位之高，不亚于后来的任何一本权威社科期刊。等我进入钟门，钟老嘱我读《文史知识》，它又成了一根度我的金针。在我忝列《文史知识》的编委和作者后，我不但更多地了解了钟老与《文史知识》的关系，对这份杂志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史知识》创办以后，钟老奠基了民间文化诸新学问。他陆续出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民俗学会“两会”的会长，同时兼任两会的刊物《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论坛》的主编。1984年，国内新编地方志工作铺开，涉及民俗志的搜集编纂工作。1985年很关键，这时他指导的高校民俗学学科建设、全国的民俗学学会机构、学会杂志兴办和各地的民俗志搜集运动都在蓬勃展开，而这些工作都汇集到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地解释中国民俗资料与传统文史文献的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看待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现代学术建设运动中，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兴起，当时这两门学问的资料和方法多得益于古典文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

始建设新时期的现代化文化，同时西方的外部文化冲击很大，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本土化的问题。在钟老看来，摆正民俗学与传统文史文献的关系，关系到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方向。中国的民间文化学问应该中国化，而不是西化而去。正是在这一年，《文史知识》派青年编辑陈仲奇到钟老家约稿。陈仲奇提前打了电话，钟老提前写好了提纲，老少都有充分准备，但这场谈话并不轻松，两人从中国现代史，讲到民俗学的国学根基，再讲到西风乍起的思潮和中国文史文化的性质，涉猎相当广泛。两人还穿越了时空隧道和代际差异，面向普通读者，抽绎可传承的文化知识点，以供刊物发表，打响民俗学研究的号炮。这件事对《文史知识》的编辑是个不小的考验，考验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学术功底，也考验他们驾驭问题的能力。陈仲奇的表现显然是让钟老满意的，钟老的文章在当年《文史知识》第6期上发表，题目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①。陈仲奇对钟老思想的传达，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前辈博大精深的阐述和历史反思之中，发挥要义，又能

^①钟敬文《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钟老此后在《文史知识》第10期发表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将两文合看，可以全面了解钟老1985年学术思想的变化。两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俗学与古典文学》对民俗学的阐述更有理论系统。

深入浅出，实在是一番增值的创造。

《文史知识》在1985年第10期刊登的《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中说：

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国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过。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民俗学在建国以后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民俗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民间文学之外，在一段时期里，整个民俗学的研究几乎成了“绝学”。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相当时期中受国外某些学风的影响，分析问题主要只从文艺学的角度出发，而且大多偏重在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

.....

把民俗学与古典文学联系起来考虑，仅仅是对古典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方面。这种考虑的根据在于：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

该互相沟通的。^①

此文从钟老所专治的民俗学切入，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史文献与民俗文献的瓜葛，概述了“五四”以来发表的民间文艺观，反思了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得失，阐述了钟老晚年学术思想的发展。论文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指出我国古典文学作家在搜集和利用民间文学方面的地位，二是强调历史主义方法的作用。钟老作为一位文学家和民俗学家，对于当时已被纠偏的极“左”思潮和“学苏联”倾向，特别是对其中几乎完全被否定的某些研究，加以重新观察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方法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和文史研究的启示作用，其实这也是我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都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对这个问题，说与不说，在今天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已无风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钟老敢提出，是出于钟老的学术良知；《文史知识》敢发表，是出于《文史知识》的文化良知；这种一拍即合就是刊物的胆识。次年，钟老在

^①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此文在《文史知识》发表后不久便被钟老收入次年出版的自选著作《新的驿程》中，详见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423—424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又发表了《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代序)》一文,正是此文的续篇。1986年和1992年,钟老编“自选集”,都选入此文^①。此文文末所谈的田野调查法和地域研究法,也在两年后付诸高校民俗学教学实践^②。

据说陈仲奇后来赴日留学,钟老不知从哪里听说这个消息,心中便多了一份牵挂。有一次,日本民俗学者百田弥荣子教授来北京举办日本有形民俗艺术展览,钟老请她做学术讲座。百田回国后,钟老门下的一个博士生赴日探亲,钟老特为撰诗一首,托她带给百田,还说有可能的话,也了解一下陈仲奇的近况,诗云:

跨海西来问老人,
讲堂花雨落缤纷;
君归正及红樱节,
无福同探上野春。

①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在此书的第582—595页。

②钟老关于田野作业和地域研究法的谈话,参见《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第593—594页。